·社会学研究·

DOI:10.20004/j.cnki.ujn.2026.01.011

辐射与吸纳: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构建逻辑与现实路径

贺　芒　简娟凤

[摘　要]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是破解传统乡村治理联结机制衰微引发的主体离散化、资源碎片化、治理效能弱化等结构性困境的关键抓手,更是锚定乡村全面振兴战略目标、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核心支撑。以重庆市X村为研究对象,构建"辐射—吸纳"分析框架,系统探究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发现,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形构以治理界面为核心载体,治理主体、资源、规则与技术等基础要素通过"以点带面"的辐射效应与"以面聚点"的吸纳效应形成动态互动。基层党组织带头人依托思想引领与组织动员优势发挥辐射作用,构建"党组织带头人—乡土精英—普通村民"的多元协同治理主体网络;通过整合产业、数字、协商等多元治理平台,实现利益诉求的精准回应、责任体系的有效聚合与治理资源的优化配置。

[关键词]乡村治理共同体;治理界面;乡村治理现代化;辐射效应;吸纳效应

随着乡村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加速转型,传统乡村治理联结机制衰微引发的主体离散化、资源碎片化、治理效能弱化等结构性困境愈发凸显,成为影响和制约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难题。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提出"到2027年,乡村全面振兴取得实质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迈上新台阶"①。有效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能够充分调动、盘活和整合各类乡村治理要素,形成治理秩序与治理活力有机统一的乡村治理格局。因此,如何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成为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议题。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当前,学界对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探讨主要依循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形成了统合、内生和共治等三种研究视角。统合视角强调党在乡村治理共同体建构中的引领功能。一方面,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发挥核心凝聚作用,通过带头人机制整合多元松散的乡村治理主体、培育和激活乡村公共性。另一方面,以"第一书记"等形式将党的干部下沉到村级党组织,形成跨层级的党组织与乡村社会相互融通的乡村治理场域,实现了政党权力的情感化在场②。此外,基层政权通过重心下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文化嵌入视域下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治理共同体构建研究"(项目编号:22BSH132)。

[作者简介]贺芒,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简娟凤(通讯作者),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邮箱:Juanfeng133@163.com。

①中共中央 国务院:《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https://www.gov.cn/gongbao/2025/issue_11846/202502/content_7002798.html,2025.01.23.

②许晓:《干部下沉何以助推乡村治理的有效性?——基于D村驻村帮扶工作的调研分析》,《中国行政管理》,2023年第2期。

沉、组织嵌入与权威嵌入,形成“嵌入型政权”[①]。

内生视角强调乡村治理共同体是由乡村内部共同的传统、习惯和信任联结形成的有机联合体[②]。这种内生的联结机制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而产生了断裂,并难以在现有的乡村治理场域中得以自然修复[③]。因此,要建立以村庄为中心的乡村共同体,使村庄在村域公共事务治理中处于中心地位,并使村民在乡村治理中处于主体地位[④]。村庄共同体的形成要以村庄本位的目标共识为基础,充分发挥乡土文化、社会网络和乡贤能人等村庄内生资源的作用。

共治视角是从乡村治理要素的多元化和治理场域的复杂性出发,强调多元主体有序参与的协同治理机制。一是明确多元治理主体的治理边界,突出各类主体在乡村治理过程中的协商与互动,通过多样化的协作平台、渠道、方式等,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协同互益的乡村治理新格局[⑤],充分发挥乡村治理的合力,形成“国家在场”“社会共商”和“文化筑基”等实践经验[⑥]。二是乡村经济社会的流动性、多元化强化了村庄与外界的关联,乡村治理共同体由侧重“内部社会秩序”转向“社会秩序+市场秩序”内外兼顾的新格局[⑦]。乡村治理共同体的边界具有弹性,需要建立一种包容性治理共同体,推动村庄治理从封闭、单一的传统“在籍治理”转向开放、包容的新型“在地治理”[⑧]。三是数字技术在强化核心行动者、增强联结密度、引入新主体和链接治理结构四个方面重构乡村治理共同体。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以社会网络融合深化共同体参与、以全要素生产率拉动共同体建设、以协调多方利益推进共同体发展[⑨]。

现有研究从统合视角、内生视角及共治视角对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建构意义、问题和路径进行了系统分析,为本研究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然而现有文献主要基于乡村治理场域分析乡村治理共同体建构过程中多元治理要素的联结机制,从静态层面揭示了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建构逻辑,而忽视了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形成是以特定的乡村治理界面为基本载体,不同治理要素之间的动态互动共同构成了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治理界面。换言之,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形成并非在场域而是在界面中形成的,在乡村治理界面中,治理主体作为核心治理要素呈现为治理“重点”,而治理平台作为关键治理载体呈现为治理“截面”。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形成是治理重点和治理截面双向互动形成的。因此,本研究试图探究乡村治理共同体的“重点”和“截面”的形成机制,剖析多元治理要素如何实现以点连面、以面聚点的内在机理和实现路径。

---

①邓大才,卢丛丛:《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实践逻辑与基层政权转型》,《求实》,2023年第2期。

②郎友兴:《村落共同体、农民道义与中国乡村协商民主》,《浙江社会科学》,2016年第9期。

③郭圣莉,邓丁,潘超韧等:《乡村共同体的瓦解与重建——我国乡镇治理的困境及其自治要素分析》,《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④牟怡:《乡村振兴中农民主体性激活的现实逻辑——以重庆市H村的实践为例》,《贵州社会科学》,2024年第7期。

⑤向良云:《资源依赖、关系结构与治理策略:乡村治理共同体形态——基于鄂西南典型乡村的调查研究》,《公共管理学报》,2023年第3期。

⑥王万平,于明慧:《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路径研究——基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润村的案例》,《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⑦郭占锋,李轶星,张森等:《村庄市场共同体的形成与农村社区治理转型——基于陕西袁家村的考察》,《中国农村观察》,2021年第1期。

⑧卢福营:《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村庄治理共同体重构》,《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

⑨胡卫卫,卢玥宁:《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生成机理与运作逻辑研究——基于“中国大棚第一村”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证考察》,《公共管理学报》,2023年第1期。

二、治理界面的辐射与吸纳：乡村治理共同体的一个分析视角

乡村治理共同体不是多元治理主体的简单叠加，而是治理主体、治理资源、治理制度和治理技术等不同类型治理要素的有序耦合和有机联结形成的价值认同、权责清晰、利益均衡、行动协同的有机统一体[①]。根据界面治理理论，在治理场域之下存在更为微观的治理界面，不同的治理要素的有机联结形成了特定的治理界面，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界面是组织间、组织与环境互动的产物，交互是界面的本质，界面是交互要素的承载体系[②]。实际上，治理界面与治理共同体具有内在契合性，治理界面不同于治理要素存在的治理场域，是以有序联结为基础的治理要素形成的集体行动能力，更强调秩序对乡村治理的正向影响。因此，界面治理本质上体现了治理要素从无序到有序的有机联结和耦合逻辑。这种有序的治理界面的形成与既有研究中强调的利益联结、情感联结和责任联结具有显著差异，联结体现为合作网络的发生和形成，而治理界面的有机联结则产生于中心节点的辐射效应和关键截面的吸纳效应。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构建过程，是中心节点产生的辐射效应和关键截面的吸纳效应双向互动的过程。

以点带面的辐射效应促进了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有序联结。辐射效应的发生与中心节点的特征属性、功能优势及其联结机制密切相关。中心主体围绕其组织结构和制度结构，向外围主体传递价值理念、制度要求，并通过行为示范辐射带动其他主体。在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构建过程中，基层党组织的带头人发挥了引领作用，尤其是在乡村全面推行基层党组织带头人与村主任“一肩挑”背景下，进一步加强了基层党组织对乡村工作的全面领导。基层党组织能够充分发挥思想引领与群众路线政治优势，通过“产业党委”“党员联户”“党员志愿服务”等制度安排发挥以点带面的联动作用，动员企业、社会组织、乡村能人、村民等有序参与乡村公共事务。而乡村能人熟悉乡村地方性知识，在乡村具有一定的乡土权威与丰富的熟人社会网络，他们作为非正式治理主体，能够对正式治理起到补充辅助作用，协调化解基层矛盾纠纷，示范带动其社会网络辐射范围内的其他村民。

以面聚点的吸纳效应为乡村治理共同体搭建有序的平台。治理界面是治理要素与治理活动的平台，催生了行动者的互动网络[③]。平台将不同治理要素吸纳到同一治理界面，多元主体与治理要素在界面中不断交互以实现整合与协同，从而形成平台吸纳效应。具体而言，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形成界面主要包括三类平台，一是以集体经济与产业合作社为依托的产业平台。在产业合作社中，农户通过交流生产经验，共享市场信息，以产业促进农户合作，同时以股份的形式将农户个体与集体利益关联起来，形成农户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激励相容机制。二是以互联网与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数字平台，具有跨时空、开放性、实时交互性的特点。比如电商平台链接了农户生产端与市场消费端，能够为农产品销售赋能，数字化信息平台跨部门整合资源让村民及时高效享受公共服务，乡村短视频与直播唤起外出村民的乡愁情感，促进人才回流。三是以多元参与、民主协商为原则的协商平台。在议事协商过程中明确各主体在公共事务中的责任，达成共识并建立责任清单落实主体责任，以提高村庄集体行动能力。平台不仅能够促进即时的互动合作，而且平台内嵌的价值理念、公共规则、知识技能等对参与主体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农户在产业平台中通过不断的互动学习掌握合作的知识与技能，在使用数字平台的过程中强化数字意识，提高信息素养，在协商平台中培育责任意识、规则意识，从而形成良性互动、有序参与的多元共治格局与长效治理机制。

---

①郁建兴：《社会治理共同体及其建设路径》，《公共管理评论》，2019年第3期。

②李文钊，翟文康：《从条块到界面：基层政府“放管服”改革的内在逻辑——基于江苏省徐霞客镇的案例研究》，《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

③韩志明，李春生：《治理界面的基本维度及其运行——公共治理变革的空间性分析》，《学术月刊》，2022年第8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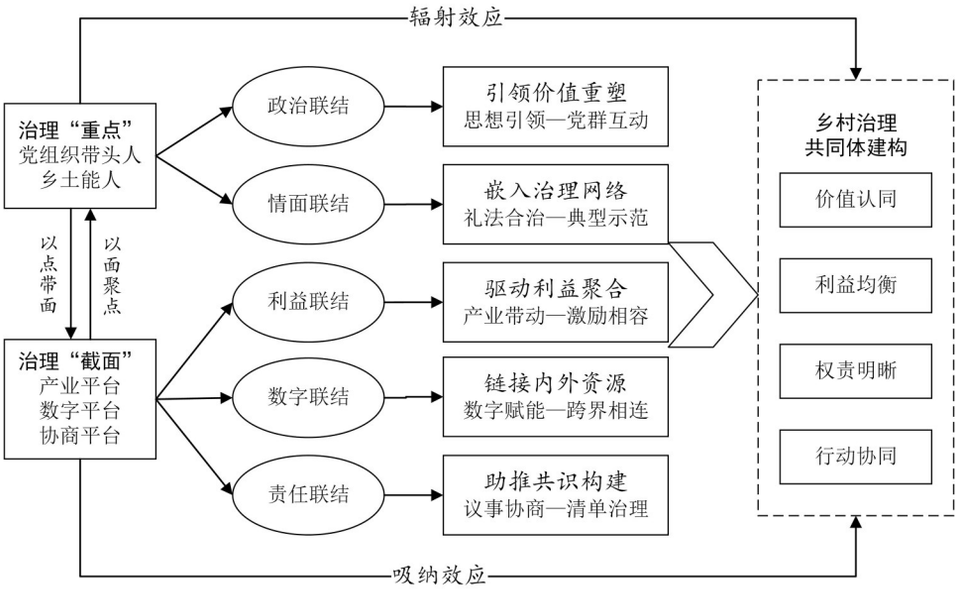


图1　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的“辐射—吸纳”分析框架

三、案例呈现:X村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过程

案例资料来源于2021年至2025年对重庆市X村的跟踪式调研。X村乡村治理实践与本研究具有较好的契合性,一方面X村作为重庆市乡村治理示范村、重庆市美丽宜居乡村、重庆市民主法治示范村和重庆市生活垃圾分类示范村,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另一方面X村通过强化基层党组织带头人,推动乡贤参与、产业带动、数字链接与民主协商实现了村民个体与村庄集体的联结,促进了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

(一)X村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基本背景

X村是重庆市C镇下属村庄,C镇距离城区25公里,是国家级现代农业核心区,特色产业以花椒、花卉苗木、有机蔬菜、水产养殖为主,素来享有“西南花卉苗木之乡”和“渔米之乡”的美誉。依托区位和产业优势,C镇2019年被选为全区首批乡村振兴试点示范镇之一,而X村是全镇乡村振兴示范村中的重点村,项目资金向X村倾斜,主要用于人居环境改造、绿化工程和产业规划。但是随着资源下乡,X村治理遇到了一系列困境。一是村庄空心化,X村共2379户,5792人,外出务工人员3183人。村庄党员大会和村民代表会议常常达不到程序要求的人数,阻碍项目工程进度。二是村民公共意识淡薄,对于与自身利益不相关的公共事务表现冷漠,比如村庄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部分村民不愿意缴纳每月2元的村庄公共卫生清洁费。三是干群关系紧张,部分村民不信任村干部,认为村干部贪污了项目经费。

(二)X村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实践经验

X村传统社会联结机制衰退以致村庄集体行动能力不足,阻碍了乡村振兴示范工程开展,因此X村围绕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创新治理机制,重建了村集体与个体之间的联结机制。

1. 健全党政核心引领机制

X村党委创新建立“乡村振兴合伙人”模式,通过优化提升基层党组织带头人,整合基层党政组织、社会组织及市场主体的复合型党建资源,与各合伙主体开展党建联建活动,构建形成跨域联动的基层党建联合体,该模式有效激活了村庄治理场域中不同行动者的参与动能。在产业发展方面

将支部建在产业上，发挥党组织对非公企业的引领作用，并以“农业企业”为聚焦，召开“感党恩·心连心·小园情”等农业企业发展暨乡村旅游座谈会。在志愿服务方面成立了院落保洁队、民生服务队、治安防控队、生产互助帮扶队、文明健康促进队5支党员志愿者队伍，在基层党组织带头人与其他党员志愿者的动员感召下，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了志愿服务队。

2. 组织乡村五老乡贤参与乡村自治

组织老干部、老教师、老乡贤、老军人、老劳模等乡土能人形成“一约两榜三会”的乡村自治机制，“一约”即村规民约，“两榜”即卫生清洁评比榜，道德评议示范榜，“三会”即红白理事会、卫生监督理事会、道德评议会，依靠乡村自治机制营造了文明乡风。同时深入挖掘乡村“先贤”、党员先锋、在册志愿者等力量，累计吸纳志愿者751人，依托141基层智治平台，把志愿者力量纳入“1+3+N”网格队伍，充分发挥他们在调和村民矛盾、带头遵守村规民约等方面的作用。

3. 搭建产业合作社平台发展集体经济

X村积极推行社企联营、社队联促、社户联帮“三联模式”，发挥社区种养殖大户、党员致富带头人的引领作用，形成了“头雁领航，强雁带动，群雁齐飞”的发展格局。同时成立花椒专业合作社，促使社区集体、市场主体和农户通过产业合作社进行“利益捆绑”，实现以“股”联心、连利、连责，通过入股分红模式与宏龙金公司、椒意花椒专业合作社签订合伙协议，2024年386名椒农取得分红资金1. 5万元。

4. 依托电商平台开启助农直播

X村整合村域内12家农业企业、7个专业合作社、5个家庭农场、15个专业大户，建立起全区首个由村集体经济运营的助农电商平台。采取“微信公众号+抖音+短视频”模式，在村便民服务中心设置产品图片展区与视频直播室，并将直播间带到田间地头，架起乡村电商桥梁，实现了农副产品季节性供应和市场需求实际有效对接。同时，通过“村书记直播带货、邮政和驻村第一书记线下配送方式”建立起农产品数字供应链，推进传统农产品交易场景数字化转型，打造电商赋能的农产品流通中枢，大幅提升了村庄农产品销售额，2024年实现年销售额26万余元。

5. 基于“院坝会”开展三事分流议事协商

“三事分流”是通过基层协商议事的方式将村庄公共事项、群众诉求按照“大事”“小事”“私事”进行分类分责处理，其中大事与政府部门的行政职能以及公共服务相关，由政府部门负责；小事属于社区公共事务，由村（居）两委主导，社会组织辅助；私事是居民的个人事务，以引导居民自我负责或寻求市场服务。通过在院坝会中开展三事分流议事协商，明确村民主体地位，加强了干群互动，厘清了乡村治理的权责边界，培育了村民的责任意识与协商能力，实现了村事村议、村事村办、村事村管。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背景下，X村以基层党组织带头人、乡土能人为抓手，以产业平台、数字平台、协商平台为引擎，重建乡村联结机制，驱动了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

四、辐射与吸纳：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的界面生成逻辑

基于案例分析发现，乡村治理网络中的节点辐射效应与平台吸纳效应共同生成了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治理界面。一方面，由基层党组织带头人和乡土能人构成的核心主体通过党群互动与典型示范作用，以点带面地引领带动其他主体实现思想价值重塑与行动网络联结。另一方面，通过产业平台、数字平台、协商平台等关键平台的多边互动与整合吸纳作用，以面带点地促进了乡村治理多元主体利益聚合、资源链接与责任共识。

（一）以点带面：辐射机制形塑价值导向与行动网络

乡村治理关键主体是治理网络中的核心节点，他们具有丰富的地方性知识与社会关系网络，基层党组织带头人与乡土能人凭借各自的资源优势，构建了政治联结与情面联结，形成了以点带面的辐射效应，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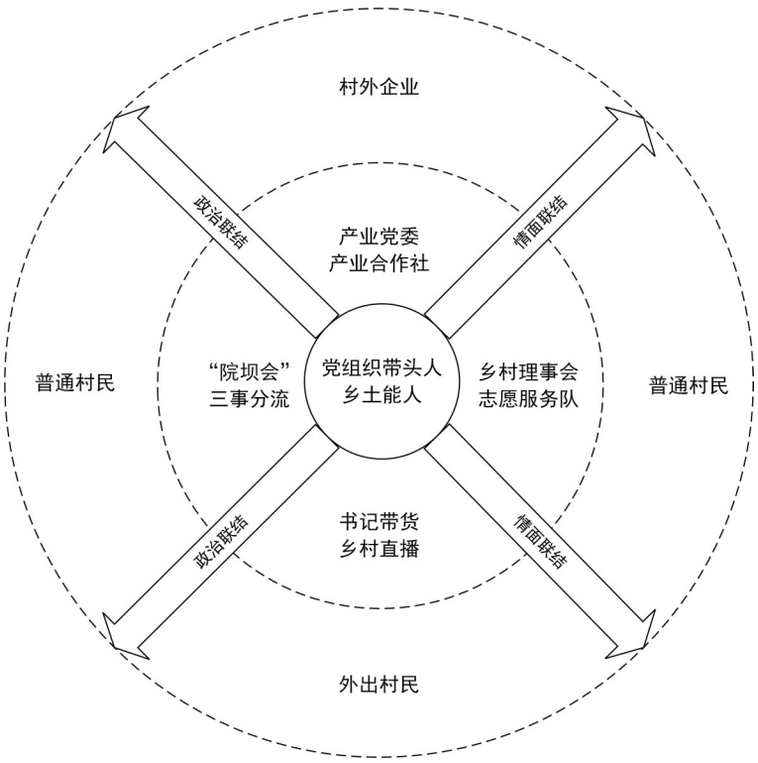


图2　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的辐射效应图

1. 基层党组织带头人引领价值重塑

基层党组织带头人组织开展党课田园讲堂,强化思想引领。党课的内容包括鲜活的党史故事、中央政策精神与乡村振兴实践等,将国家政策与核心价值理念转化成村民听得懂、用得上的知识,从而筑牢乡村治理的思想根基并促进了村民行动自觉。同时党课的地点不局限于会议室,而是搬到院坝、田间、网格中,使得党课由单向灌输向双向互动转变。此外,针对在外党员建立“流动党员之家”,听取他们对家乡发展的意见和建议,确保流动党员离家不离党。

基层党组织带头人是农民致富的“领头雁”。在政治素养好、致富能力强的本土人才中选拔基层党组织带头人能够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引领力与组织力[①]。基层党组织带头人从三个方面促进了村集体经济发展:一是示范带动村民增收致富。X村实施了村级党组织带头人优化提升行动,鼓励村干部作为致富带头人盘活集体资产,创办农民企业,发展壮大乡村集体经济,带领村民增收致富。二是发展产业党支部。基层党组织带头人在非公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里发展党员、成立产业党支部,在产业园区建立产业党委,发展企业经营骨干入党,实现了支部建在产业上,党员聚在产业上,农民富在产业上。三是打造文旅品牌拉动消费。X村党组织带头人整合村内资源打造了具有知名度与影响力的年猪文化品牌与乡村“绿跑”品牌,带动了农产品销售与周边餐饮消费。

基层党组织带头人引领参与公益服务,培育村民公共精神。一方面党组织带头人整合党员力量成立党员志愿服务队,开展农产品助卖、村庄义务清扫、帮助贫困户采摘花椒等志愿服务活动。另一方面将党员志愿者嵌入乡村治理网格,实施党员就近联户机制,提高了乡村网格化治理的精细化水平。

①王同昌:《习近平关于提升村级党组织组织力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及实践要求》,《科学社会主义》,2024年第6期。

2. 乡土能人嵌入治理网络

乡土人情网络嵌入治理网络。基于血缘、地缘及文化认同构建的乡土人情网络，通过共享规范、互惠传统与情感联结形成的社会资本，为乡村治理体系提供了柔性补充机制。自然村的熟人社会网络仍然保存比较完整，乡土能人是熟人网络中的关键节点，凭借其社会威望与地方性知识而拥有较多的人情面子。热心村庄公共事务的乡村能人，面对不规则且复杂的乡村社会，能够协助基层政府与村两委宣传惠农政策、协调领里纠纷、动员村民参与等，实现人情网络嵌入治理网络，促进乡村有效治理。X村通过成立“三会”乡村自治组织，推选村庄中的五老乡贤即村里有威望、能力强、热心公益事业的老干部、老教师等老同志担任三会理事及成员，从而有效发挥了熟人网络的情面联结在乡村矛盾纠纷中的协调作用。

典型示范的正向引导治理效应。在乡村治理实践中，通过评选先进典型，构建榜样示范效应与价值导向机制。X村通过典型示范引领明确了正向引导方向，有效发挥了榜样带动效应。比如结合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评选“五星文明户”“最美院落”“最美志愿者”等。此外，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效应与激励作用。X村设立“道德评议榜”和“卫生评议榜”，评选出“好儿媳”“好婆婆”在村庄院坝与微信群中进行张榜公示，并组织本镇10名乡土宣讲员深入院坝开展道德模范事迹宣讲。

（二）以面聚点：吸纳效应助推利益聚合、资源链接与责任共识

关键平台联结机制主要体现为多边互动平台的整合吸纳效应。基层政府通过构建产业平台、数字平台、协商平台建立起乡村多元主体之间的利益联结、数字联结与责任联结，从而促进多元主体利益聚合、内外链接、共识建构，形成多元共治的长效机制，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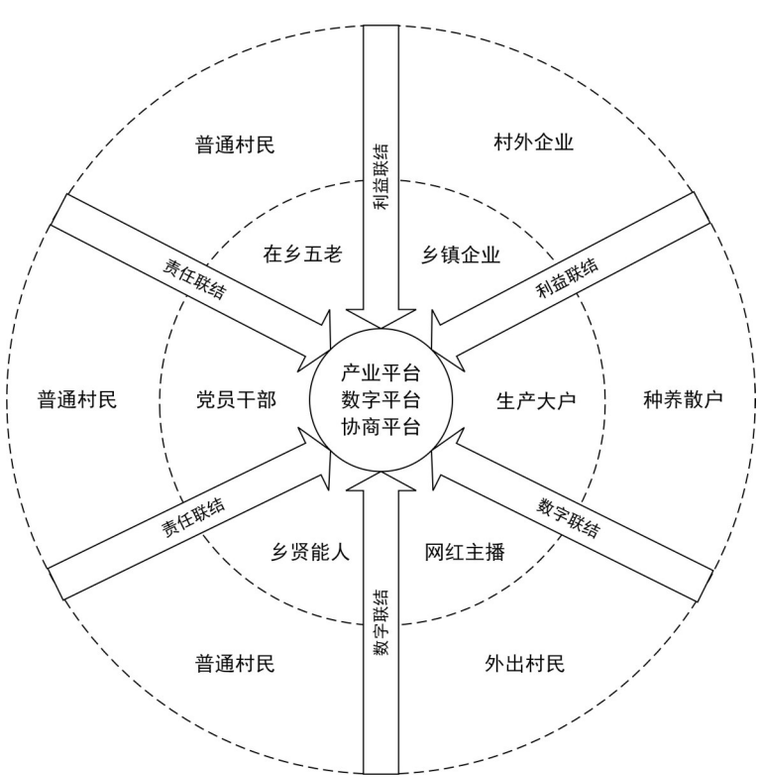


图3　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吸纳效应图

1. 产业平台驱动利益聚合

搭建合作平台建立互利共赢机制。产业合作社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组织形式，在推动

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农民增收和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中发挥了显著作用。合作社能够有效打破传统农业中小农户分散经营的结构性困境,通过集聚农户资源、整合生产要素、提升组织化程度,实现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的农业生产与市场运作。合作社将农户、集体与市场有机融合,既保障了农户的基本收益,又通过盈余分配、股份分红、劳务用工等多元方式拓宽其增收渠道,激发了农户参与积极性与内生发展动力。X村依托品牌椒业、花卉苗木、生态养殖、绿色蔬菜成立农业专业合作社。合作社秉承农户自愿联合、民主管理、互帮互助的原则,以其成员为主要服务对象,提供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农产品的销售、加工、运输、贮藏以及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等服务。X村合作社促进了各主体之间的交流互动、合作共赢,公司将市场信息和订单带给合作社,并邀请技术专家培训农户科学种植。合作社将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承包外出农户的流转土地,转变小农生产为标准化、规模化生产,进而实现各方互利共赢、合作发展。

完善经营模式推动各方利益联结。X村通过"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运营模式使得村集体、市场主体和农户通过产业合作社进行"利益捆绑",实现"股"联心、连利、连责。村民以土地入股村集体合作社获得保底收益,也能在基地内务工,实现稳定增收。村集体则与公司制定基地绩效管理考核办法,只要每年年底高粱的产量和管理达到了公司要求的标准,公司就给予村集体资金分红。同时,规模化经营还提高了生产积极性,公司与合作社规范引导农户以土地、劳动力或资金等形式参与其中,实现从单一生产者向产业链一体化参与者的转变。

优化合作机制促进多元利益协调。马克思共同体理论指出"真正的共同体"是自由人联合体,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具有同构一致性。建立农户利益、企业利益与公共利益的联结机制是构建共同体的关键。X村通过产业合作社建立了村集体、市场主体与村民个体之间的利益连带,依托合作社完善利益分配机制,通过合作社成员大会明确利益分配方式,保证了各方利益均衡合理,在合作中培育村民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公共精神。X村多元利益协调机制通过合理设计利益分配机制与风险控制体系,能够有效缓解多方矛盾,推动不同利益主体在农业产业链与供应链中实现功能互补与资源共享,进而构建起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合作格局。

2. 数字平台链接内外资源

电商平台搭建农产品数字供应链。互联网、信息技术等数字化资源为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现代化注入了云动力。电商平台通过技术赋能与资源整合,构建起以信息流、资金流、物流为核心的农产品数字供应链体系,显著提升了农业生产与流通的组织化、标准化与智能化水平,有利于改变传统农业"产销脱节、信息滞后、交易不畅"的发展困境。X村通过网络电商平台不仅连接了村内生产端与村外市场端,还扩大了村庄农产品销售渠道,同时X村在本地党员和致富带头人中选拔形象好、推广能力强的人员发展为直播带货骨干,培养本地"网红主播",成立X村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村党委书记为法人代表,帮助合伙企业和村民销售农副产品。电商平台不仅拓宽了农产品销售渠道,强化了农村经济的外向型特征,也推动了城乡资源要素的双向流动与深度融合。

依托数字平台构建脱域治理共同体。数字平台凭借开放共享、跨时空的特性深刻影响着乡村治理结构与治理过程,数字媒介成为村民互动交流、获取信息的重要平台,充分利用这些数字平台能够建立起乡村脱域治理共同体。一方面,乡村微信群使得外出务工村民能够脱域参与乡村治理,形成了网络化乡村治理场域,村民能够跨时空及时反馈需求与问题,使得多主体脱域共同在场成为可能,有效缓解了乡村公共事务中主体缺失困境。另一方面,一体化数字服务平台既能够促进基层跨部门协同,资源整合与信息共享,提高居民办事效率,也能缩小乡村"数字鸿沟"。当前乡村宽带网络、5G光缆等数字基础设施基本实现全覆盖,但是在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的使用上,乡村与城市社区相比还存在巨大差距,通过搭建乡村数字公共服务APP、小程序,鼓励村民在使用数字平台过程中培育数字理念。数字平台有利于破解当前乡村治理中"村庄空心化、事务复杂化、资源碎片化"的现实困境。

乡村短视频直播唤醒在外村民的乡愁情感联结。乡村空心化、人才流失问题导致村民与村庄的联结逐渐弱化，而乡村短视频与直播重塑了城乡资源、文化互动的时空逻辑，以情感为纽带激活在外村民对乡村振兴的参与动能，为人口流动背景下乡土文化的存续与创新提供了数字化解决方案。X村通过制作乡村风貌短视频，直播乡村场域内村民的“村晚”“村跑”等活动，让在外村民能够听乡音，看乡容，激发他们的家乡认同感、归属感，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进乡村人才回流。

3. 协商平台助推共识构建

利用“院坝会”开展三事分流。院坝会是以自然村（村民小组）为单位开展的小型议事协商会，由于院坝会所在的场地是村民日常聚集活动较多的场地，能够有效组织动员村民参与。X村以院坝会为平台开展三事分流，三事往往是相互联系的，比如村庄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项目经费管理、村容村貌规划、基础设施建设是政府负责的大事；村庄公共环境卫生清扫保洁属于村两委、社会组织负责的小事；而村民个人院落与家庭卫生清洁是居民的私事，三类事任何一类事处理不好，村庄人居环境整治工程都不能顺利完成并验收通过。三事分流机制将基层政府、村两委、社会组织、村民整合到议事协商平台，围绕村民诉求，厘清各方的职责边界，并形成责任共识。比如X村通过院坝会讨论公路卫生费，部分村民认为公路与自己不相关，不愿意出公路卫生费。而通过在自然村开展院坝会的方式培育了村民的公共意识。

基于责任共识促进协同行动。三事分流议事协商机制促进乡村治理由“政府独唱”向“群众合唱”转变，议事协商过程强化了多元主体的责任共识，明确了乡镇政府、村两委、社会组织、村民各自的权责边界与责任连带。三事分流机制既能允许各利益主体理性表达诉求，使得各方能够达成责任共识。也能依据各主体的能力范围进行合理分责，涉及行政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的“大事”由政府负责，村庄内的“小事”由村两委联合社会组织协调，对农户个人的“私事”由村两委引导其自行处理。

建立三事清单制度并保障责任落实。清单制度以事项为导向、以职责为核心，将碎片化、抽象化的治理要求转化为具体、可量化的执行项目，使得各级主体在责任划分上更为精准，治理过程更具条理。X村建立三事清单动态管理机制，通过三事清单记录村庄公共项目的推进方案与矛盾纠纷的解决方案，可为后续的类似事项提供借鉴，避免重复讨论降低效率。

总体而言，核心节点辐射与关键平台吸纳是融合互嵌的关系。乡村治理场域中核心治理主体与关键治理平台不是截然分离的，二者是互嵌互构的关系。首先，主体是平台中的核心节点，平台为主体提供互动场域与制度支撑。换言之，治理界面的有效运作离不开重点主体的引领与带动以及关键平台的资源支撑与制度保障。比如在X村“三事分流”协商平台中，村干部和“三会”五老乡贤是治理网络中的核心节点，连接了政社互动的协商平台，而三事分流协商平台为村两委和“三会”开展社会动员提供议事协商机制与合法性保障。其次，辐射与吸纳的作用发挥是相辅相成的，辐射作用弱则可能导致协商参与冷漠，村民议事协商沦为形式主义，乡土能人“脱草根性”也将导致民意基础不足。而吸纳作用弱则可能导致由于资源与制度供给不足带来的治理主体离散或精英俘获困境。因此，既要强化乡村关键主体的网络中心性，重塑乡村治理复合权威，又要健全乡村治理平台的制度机制，规范各治理主体有序参与。最后，“点”与“面”融合互动系统作用于乡村治理共同体。主体遵循以点带面的辐射效应，通过价值理念、行为示范、社会网络辐射带动外围主体形成治理界面，重塑乡村公共价值，编织集体行动网络。而平台遵循以面聚点的吸纳效应，通过利益聚合、资源链接、共识构建吸纳多元治理主体，实现有序参与，多元共治的长效治理格局。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治理共同体建构的“辐射—吸纳”融合分析框架，深入分析了乡村治理共同体建构的

界面生成逻辑,不同于既有研究的静态视角,本研究从动态视角揭示了乡村治理要素的互动过程。研究发现,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是核心节点的辐射效应和关键平台的吸纳效应双向互动的过程。一方面,基层党组织带头人与乡土能人是乡村治理网络中的核心节点,以核心主体的社会网络的中心性辐射带动外围主体。通过党建引领机制与乡土权威重塑,建立基层党政主体与乡镇企业、村民之间的政治联结以及五老乡贤、乡土能人与普通村民之间的情面联结。通过政治联结引领乡村核心价值、共富理念与公共意识,重塑了乡村公共价值;通过情面联结拓展乡村治理网络,树立典型正向引导,形成舆论声誉约束,促进了乡村集体行动。另一方面,通过搭建产业平台、数字平台、协商平台,以治理界面的公共性、开放性、交互性吸纳整合多元主体。依托产业合作社、数字网络平台、议事协商机制建立乡村多元主体之间的利益联结、数字联结与责任联结,以利益联结驱动多元利益聚合,以数字联结链接乡村内外资源,以责任联结促进主体共识构建,进而形塑了乡村共建共治共享的格局。

同时,本研究提供了从个体到集体到国家的多维立体国家—社会分析框架。现有多数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中的社会主体只关注村委会、社会组织、乡贤,却不见普通的个体村民[①]。而激发广大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主体性是乡村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关键,本研究探究了“点面”连带机制对个体村民的联动作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现有研究。

此外,研究发现对乡村治理实践亦具有启示借鉴意义,即充分利用了乡村社会连带资源对多元主体的联结作用。虽然在市场化与城市化的冲击下,传统乡村基于宗族团体、礼治秩序的传统连带逐渐弱化,但是在新时代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基层党组织、新乡贤、乡村社会组织、产业合作社、数字服务平台、议事协商平台等社会连带资源广泛存在。基层政府应有效利用这些社会连带资源,实现社会性到公共性,连结到团结的转化。

[责任编辑:王文娟]

①邓大才:《乡村建设行动中的农民参与:从阶梯到框架》,《探索》,2021年第4期。